

温州文献丛书

二

郑

集

〔宋〕

郑伯熊 撰

周梦江 校注

梅頭山

永嘉縣

温州府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出版社

温州文献丛书

〔宋〕郑伯熊

郑伯谦 撰

周梦江 校注

二 郑集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郑集/(宋)郑伯熊,(宋)郑伯谦撰;周梦江校
注.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温州文献丛书)
ISBN 7-80681-844-8

I. 二... II. ①郑... ②郑... ③周... III. ①郑伯熊一文
集②郑伯谦一文集 IV. Z4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3205号

二郑集

撰 者:[宋]郑伯熊 郑伯谦

校 注:周梦江

责任编辑:谷 君

责任校对:毓 敏

封面设计:姜 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7.25

插 页:3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册

ISBN 7-80681-844-8/K·212

定价:17.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温州古称东瓯,历史悠久,宋代以来名家辈出,人文荟萃,地方文献之盛冠于浙东南。温州市图书馆收藏大批稿本、抄本和刻本,市博物馆和其他部门也积累了许多珍贵文献。在建设现代化新温州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

近代温州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清同治光绪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丛书》十五种二百五十二卷,民国四年如皋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十四种二十二卷,二三十年代永嘉黄群刻印《敬乡楼丛书》三十八种二百八十九卷,抗战爆发之前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四百零二种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嘉惠学林,功绩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依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两浙作家文丛、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等先后入选温州名贤著作若干部,其著名者为《叶适集》《习学记言序目》《宋宰辅编年录》《林景熙集校注》《永嘉四灵诗集》《真腊风土记校注》《高则诚集》《刘基集》《礼记集解》《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宋恕集》《夏承焘集》等;民间自发刊印者包括《王十朋全集》《陈傅良先生文集》《董每戡文集》《苏渊雷文集》等数种。1992年温州师院语言文学研究室计划编印地方文献丛书;1996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辑刊《孙诒让遗文辑存》《陈虬集》的基础上,发起设立温州先贤遗作征编委员会及基金的提案;1998年胡珠生先生等提出关于整理出版《温州

古籍丛书》的倡议,限于经费和条件,未能如愿。

随着温州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温州文化升位计划不断推进,文化建设倍受领导关注。2001年,钱兴中市长亲自召开座谈会,共商地方文献抢救事宜,成立《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拟订五年规划,抽调人员,设立编辑部,拨出专项经费,并得到温州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温州烟草公司等捐资赞助,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温州文献丛书》宗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着眼于文化品位和学术气氛的营造和提升,积极推进温州两个文明建设,向文史研究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一整套完备而有新意的温州地方文献的基本资料,以供阅读参考和分析研究。在力求出精品的同时,努力造就若干热心文化事业、尊重学术规范、钟情文献工作的青年学人,达到既出书又出人的目的。

本丛书要求:

- (1) 所收诸书性质上限于温州相关著作和温籍人士著作。
- (2) 地域范围以现行辖区为准,即鹿城、瓯海、龙湾等区,瑞安、乐清两市,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县。
- (3) 时间以成书于1949年前为限,个别选题酌情下延。
- (4) 内容以文学、历史学、哲学、科技等方面的重要古籍史料为主。
- (5) 步骤:以抢救挖掘稿本、抄本、孤本为重点,兼顾整理文集类及零散资料汇总类,优先安排有全国性影响、学术价值较高、富有原创性的著作。
- (6) 整理方式:包括编校、标点、注释,并撰序言,编辑附录。要求认真严谨,底本应选择较早较准确的刊本,尊重原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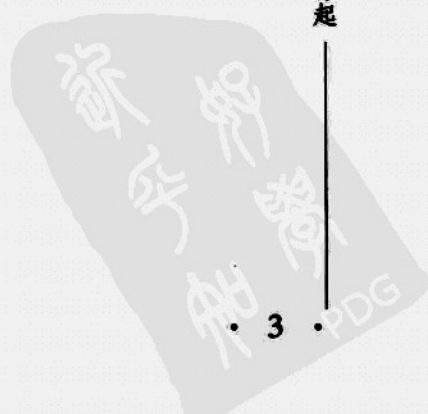
标题、卷次及文字,注明资料来源或藏所。

采用横排、简化字形式出版。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〇二年七月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凡例

1. 收集原书各种版本进行比较,辨其源流,选择时代较早、内容完整、校刻最精者为工作底本。整理时用其余各版本通校,并于“前言”中列明底本、通校本及参校要籍的名称、版讯(包括本书援用时的简称)等。

2. 尽量参考前人校勘成果,充分吸收其合理意见,并尽可能对原书的引文进行复核,校注中的举证和引书均应准确无误。

3. 各本文字与底本相同者,不再标出;与底本歧异者,若底本不误而他本误,正文用底本,除需作说明者外,一般不出校。若他本文义较胜,则正文改从他本,校语中注明原误作某、脱某字或衍某字。如各有所长,不能断定是非,则正文仍用底本,在校语中标出他本异文(举一二有代表性者为例)。

4. 正文或原注有疑而无法解决者,加“(?)”或在校语中说明。

5. 校改符号用法如下:

(1)脱:在()内补入脱漏的文字。

(2)衍:将衍字写在〈 〉内。

(3)讹:在讹字后面用[]标出,写入改正的文字。

(4)难辨文字或无法补正的脱字,以“□”代替。

6. 原书所用异体字,凡无关文旨者,均改为通用字。他本已用通用字者,不再出校。

7. 原书所用避讳字,如“弘治”作“宏治”、“陶弘景”作“陶宏景”等,据古本及原书改回,但必须有确据。首见处出校或加

注说明,其余径改,不再一一出校。缺笔字则补足笔画。

8. 原书行文中涉及国家、朝廷、上司、宗族等所用的“抬头格”均予删除。

9. 凡一篇数首,一首一段,两首之间不空行,不标各首序次。

10. 校注文字置于正文每篇(题)之后,编号每篇(题)自为起讫。校文序号均用“①②③……”列于正文右上角,句末可列于标点符号之外。

11. 校语注释力求简明扼要。原注均予保留。新增注释以乡土人物、事件等为主;凡涉及名物训诂与音读的内容,除非普通辞书、字典未收入,或虽已收入而存在误释,一般不注。

12. 征引资料须详明出处。先秦要籍、二十五史、通鉴等可省略撰(著)者。其他著述,首次引用时均按时(朝)代、撰(编)者、卷次(或篇章名)、版本、页码为序标明;多次引用只注撰者、书名、卷次(或篇章名)、页码。卷次用汉字(双位数以上,如卷二三,不作卷二十三,其余类推)。古籍线装本页码亦用汉字。

13. 各书附录及资料汇编类选题,如已有单独出版者,重复内容不再编入,将有关情况在前言或后记中加以说明。

14. 凡因选题存在特殊性(如只有一种文本传世,不存在版本校勘的问题),本凡例所列条款难以适用者,可在前言或后记中酌情说明。

校 注 说 明

一、本书由郑伯熊文集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合编而成,故定名为《二郑集》。

二、郑伯熊文集,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曾有“郑景望集三十卷,宗正少卿永嘉郑伯熊景望撰”著录。据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卷一九郑景望集按语:“文渊阁书目九,有郑景望集一部,一册缺。此书明时尚存,今则未见传本。”因此,本书只能以《郑敷文书说》和从王与之《周礼订义》中抄出的郑氏《周礼说》以及从《慎江文征》抄出的《经解》、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整理的《全宋诗》中抄出九首诗歌、从《四库全书》抄出的几篇佚文,合为《郑伯熊集》。

郑伯谦文集则以《太平经国之书》入编。

郑伯熊文集,以中华书局版《丛书集成初编》的《郑敷文书说》为底本,因该书以“艺海本在先,故据以排印”。校以《四库全书》本及《函海》本。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以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为主,校以《四库全书》本。

三、参校用书主要有:

宋王与之《周礼订义》,通志堂经解本。

清孙衣言《瓠海轶闻》,清宣统三年瑞安刻本。

清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浙江图书馆 1921 年、刻本。

清全祖望增补《宋元学案》,《四部备要》本。

清厉鹗《宋诗纪事》,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版。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版。

明、清《温州府志》和《永嘉县志》以及温州市图书馆所藏的《慎江文征》（清戴氏抄本）、《东瓯先正文录》（清道光八年梧竹山房本）、《东瓯诗存》（抄本）等书。

四、《郑敷文书说》是《尚书》中一些篇章的释义，《太平经国之书》亦有一些句子颇难理解，因此对一些重要或特殊辞语稍加注释。

五、郑伯熊在《宋史》中没有立传，其文集又已失传，故特作《郑伯熊年谱简编》，以见其生平行事。

六、本书在点校注释过程中，曾请友人上海大学来可泓教授与主编胡珠生研究员通读一遍，有所是正，谨此致谢。



永嘉之学如何从性理转向事功

(代前言)

一、永嘉之学的思想源头

永嘉事功学派形成于南宋前期,产生于两浙东路的温州,因为这些主张事功的众多学者都是温州人,温州古称永嘉郡,所以称为永嘉事功学派,简称永嘉学派或永嘉之学。

永嘉学派思想主要有两个源头,叶适《温州新修学记》说:

昔周恭叔(行己)首闻程(颐)吕(大临)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侔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绝,俨然如醉忽醒,梦方觉也。颇益衰歇,而郑景望(伯熊)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

薛士隆(季宣)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傅良)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铄称铍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也。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矣。(《叶适集》卷一〇,中华书局1961年版)

这篇文章对永嘉学派来说,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因此全部抄录下来。我在十年前写过的《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1992年版),谈到南宋前期温州曾出现三派学术思想,即郑

永嘉之学如何从性理转向事功(代前言)

伯熊之学,薛季宣之学和徐谊之学(近似陆九渊之学,局限于平阳县,后来继承者彭仲刚等转向事功)。当时因种种关系未谈郑伯熊兄弟之学如何由性理转向事功。近年深感这一问题必须讲述清楚,因此略述于下。

温州近年经济发展,温州商人足迹遍于全球,因此名气大振,闻名于全国以至全世界。实际上,宋代以前的温州,僻于东南沿海一隅,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交通闭塞,是个“僻远下州”(叶适语)。隋唐以前,世少闻人。北宋时由于工商业与农业比较发达,文化开始提升。既有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的王开祖、林石、丁昌期讲学活动;后又有元丰、元祐年间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安上等九先生传习伊洛之学回到家乡讲授,从而使洛学在温州传播。

洛学首创于程颢、程颐兄弟,终北宋之世,二程之学一直在民间,影响不大。可是,到南宋初期突然暴发起来,成为宋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显学。叶适在其文集的《郭府君墓志铭》中说:

昔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考古圣贤微义,达于人心,以求学术之要,世以其非笈传旧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公元1169-1170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水心文集》卷一三,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北宋中期以来,王安石的荆公新学一直居于宋学主导地位,洛学、苏轼兄弟的蜀学一直是支流。可是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赵构君臣追究亡国责任时,赵构不说宋徽宗赵佶是亡国的罪魁祸首,却将罪责转嫁到王安石变法与荆公新学。崇拜洛学的胡安国和二程门人杨时乘机大力攻击荆公新学,宣扬洛学,经过杨时等人的努力与南宋政府的支持,荆公新学从此逐渐消失,而洛学(或称理学)遂成为南宋学术界的显学,杨时亦被人尊为“理

学南渡大师”和“闽学鼻祖”。

因为杨时是福建将乐人，洛学遂传入福建。杨时传之于罗从彦，罗从彦传之于李侗，再由李侗传于朱熹，称为闽学，其实就是洛学，亦称程朱理学。朱熹大大发展了理学，到了南宋乾道五六年达到高峰。

也就在这时，在南宋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两浙东路开始出现了理学的反对派。他们以经制解释义理，主张务实，反对空洞说教；主张用世，反对修心养性，诚如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所讲：“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目朦胧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以为何等也。”（《宋元学集》五一卷《水心学案》）他们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统称为浙东学派。

本文前引叶适《温州新修学记》所述，永嘉学派的思想来源有二，其一即是周行己传给郑伯熊的性理之学，亦即洛学。周行己是程颐的学生，他与游酢、尹淳是同学，《二程集》的《程氏外书》当中有他们向程颐问学、交流的记载。关于周行己的生平思想，我在所整理的《周行己集》（《温州文献丛书》2002年版）的《前言》已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二、永嘉之学转化的关键人物

自北宋晚期的周行己到南宋前期的郑伯熊所讲习的永嘉之学，即是上面《温州新修学记》所说的“必兢省以御物欲”的性理之学。可是它如何由性理之学转为事功之学？根据文献，这一转化的关键人物是郑伯熊、伯英兄弟。

郑伯熊（1124？-1181）字景望，学者称为敷文先生。温州永嘉县（今温州市鹿城区）人。南宋前期，温州文化教育事业相

当发达,温州属下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四县,人口不到一百万(约九十一万多,见清同治《温州府志·户口》,参见《宋史·地理志》),而士人则有几万人。叶适在《包颛叟墓志》说“温之士几万人,其解额拘于旧额,最号狭小。”(《叶适集》卷二三)陈傅良也讲到温州每次解试:“间岁贡士,郡试且万人。”(《陈傅良集》卷三九)参加解试的士人有一万人,一般的士人当有几万。郑伯熊及其胞弟伯英就是这几万士人的领袖。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的郑伯熊传略中说:

宋乾(道)淳(熙)之间,永嘉学者连袂成帷,然无不以先生(指郑伯熊)兄弟(其弟郑伯英)为渠率(率,古通帅,渠帅即领袖)。

郑伯熊出生于永嘉一个士人家庭,父亲郑熙绩曾任温州州学学录。母亲陈氏,出身官宦人家,其父陈豫赠奉直大夫,其兄陈一鹗官至朝散大夫。因此,郑伯熊少年就受到良好教育。他22岁中绍兴十五年进士,27岁出任台州黄岩县尉,因正直刚强,坚不可磷,被人称为石莲县尉。后任婺州司户参军,召试馆职,任秘书省正字、国子丞、著作佐郎,吏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读,外放福建省提举茶盐公事,直敷文阁宁国府魏王司马,因劝谏魏王赵愷不听,自劾回家,改江西提刑,奉祠。不久起知婺州,升国子监司业兼国史院编修,宗正少卿,51岁以直龙图阁知宁国府,任满,调任建宁府知府,淳熙八年(1181)死于任上,享年约58岁。

郑伯熊在《宋史》虽无立传,但《宋史》有两处称赞他。一在《宋史·儒林四·陈傅良传》说:“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一在《宋史·隐逸下·徐中行传》,讲到他和徐中行之子庭筠有所交往。而且官居丞相的周必大和大儒朱熹对他的品行治绩多有赞赏之辞,可见郑伯熊在当时是颇有名誉的。

他的胞弟伯英(1130-1192)字景元,又字去华,自号归愚

翁。为诸生时，“绍兴末，上《中兴急务》十篇，极言秦桧之罪”（《林下偶谈》卷四）。隆兴元年（1163）中进士第四名，按照当时惯例，进士第四名与上三名：“踵蹶以进，累日月皆至卿相”，（《叶适集》卷二一《郑景元墓志铭》）但他因母老需要奉养，时常请假在家，所以官仅止于判官、推官之流的低级官吏。当时温州士人尊称他为小郑公，郑伯熊为大郑公。

郑伯熊是周行己的私淑弟子，继承周行己的洛学，亦即理学。全祖望《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的周行己传略说：

永嘉诸先生从伊川（程颐）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指周行己）尚有绪言。南渡之后，郑景望私淑之，遂以重光。

郑伯熊出生时（约在北宋宣和六年，1124），周行己已离开温州，不久即病卒于山东郛州。但周行己遗著《浮让先生集》和后集在他身后即已出版，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七已有著录，并说明自己祖母是周行己的第三个女儿。因此，郑伯熊在家乡当可读到周氏遗著。当时人士也都承认他们兄弟能继承周行己的洛学，而且在宋高宗绍兴年间，秦桧当权禁止洛学之时，他兄弟二人仍提倡洛学。全祖望《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的郑伯熊传略说：

方秦桧擅国（自绍兴八年再任丞相至绍兴二十五年病死），禁人为赵鼎、胡寅之学（即洛学），而永嘉乃其寓里（按：秦桧是南京人，秦桧初登相位于绍兴二年八月罢免，温州是当时大后方，故秦桧寄居温州，并于绍兴五年出任温州知州），后进为所愚者尤多。故绍兴末，伊洛之学几息，九先生（指周行己等九位洛学弟子）之绪言将衰歇。……先生（郑伯熊）兄弟并起，首雕程氏书于闽中，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

郑伯熊这时提倡洛学，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也说明他爱好周行己之学。所以，叶适在《郑景元墓志铭》中也赞美他俩兄弟

说：

方秦氏(桧)以愚擅国,人自识字外,不知有学。独景元(郑伯英)与其兄(郑伯熊),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会,师友警策,惟统纪不接是忧,今天下以学名者,皆出其后也。(《叶适集》卷二一)

可是,郑伯熊兄弟所继承周行己“必兢省以御物欲”的性理学说如何转向“必弥纶以通世变”的事功之学呢?

这时,主张事功学说的薛季宣恰从武昌县令任满回到家乡温州,因此有了转化的机遇。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或作士隆,学者称艮斋先生,温州永嘉县人。《宋史·儒林四》有传。季宣六岁时,其父起居舍人薛徽言与秦桧庭辩议和事,中寒疾而卒,母亲胡氏相继下世。遂为三伯父薛弼收养。薛弼曾任岳飞参谋官,后历官荆南、福州、广州转运判官、安抚使等职,季宣随之宦游大江南北,熟闻南宋初期抗金事迹。17岁时薛弼亡故,往依其岳父荆南安抚使孙汝翼,抄写机密文字,向湖襄著名学者袁溉受学。袁溉曾问学于二程,举进士,尝集乡民抗金,后从薛翁学习。溉学极博,主张事功。季宣尽得其学。绍兴三十年(1160)薛季宣27岁时,以恩荫任鄂州武昌(今湖北鄂城)县令。金兵南下侵略时,他依靠民兵坚决防守,当时湖北官吏纷纷将家眷送回内地,独季宣将家眷留在城中,表示与人民共存亡,因此武昌得以保全。任满后,谢绝各方邀请,到临安(今杭州市)选调。孝宗隆兴二年(1164)回永嘉老家候缺。这时,郑伯熊自隆兴元年三月召任秘书省正字后,八月因病监潭州南岳庙,奉祠在家。其胞弟郑伯英于隆兴元年中进士第四名,这时亦正在家等候差遣。于是郑伯熊兄弟便与薛季宣订交,因他们三人同住在温州城内,交游密切,彼此思想都受影响。这在他们的文章中有所叙述。薛季宣《送郑景元赴秀州判官诗并序》说:

走归自武昌，始获交于景望、景元昆季，二郑兄弟不以我之无似，不屑与之友。居之相远也，相从之日少；志之相得也，相与之意深。居数年，景望召为国子丞，又两逾时，景元赴由拳（秀州，今浙江嘉兴市）从事。（《薛季宣集》卷六，《温州文献丛书》2003年版）

以后，郑伯英在《祭薛季宣文》也说：

岁在甲申（隆兴二年），公归里居，始获从公，公始我知。（《薛季宣集》附录一）

郑伯熊兄弟与薛季宣订交后，经过数年的论学问道，二郑对薛季宣的事功之学非常佩服。有鉴于当时国家局势，二郑兄弟知道自己过去所研习的性理之学无补于国事，而薛季宣的事功之学确实有用。于是二郑兄弟由此转向事功之学。郑伯英在《祭薛季宣文》说：

圣贤不作，道丧文弊。问学事功，歧而为二。事功维何？惟材与力。问学维何？书痴传癖。学不适用，用者无学。为己为人，在在乖错，公之探讨，专用律身。推而放之，于以及人。纵论今古，衮衮忘疲。旁及制度，援笔而图。……治官训农，理财练兵。厥有成算，宣其可行。（《薛季宣集》附录一，《温州文献丛书》2003年版）

郑伯熊与张淳合写的《祭薛季宣文》说：

自从公游，十见重九。……我所未闻，公必析剖。一事一辞，据引精到。语妥理从，出我意表。箴过质疑，每见辄有，论未所及，诂一二数。直谅多闻，其伦盖少。求之古人，实我良友。（《薛季宣集》附录一，《温州文献丛书》2003年版）

薛季宣的事功之学对国事有用，非但二郑兄弟倾心敬佩，而当时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的吕祖谦，也是十分佩服。吕氏曾经写信给朱熹说：